

唐代丝绸之路中段西州与龟兹的商贸研究

张安福

(上海师范大学 历史系, 上海 200234)

【摘要】从长安经西州、龟兹的丝绸之路是唐代重要的商贸通道,负责唐朝西域军政事务的安西都护府先后设置于西州和龟兹,两地的商贸物流便利、交通频繁,西州成为龟兹重要的商品供给地和战略后方,龟兹成为拱卫包括西州在内的西域局势安全的战略中枢,贸易各有特色、互补性强。城市功能决定了城市商业贸易发展的方向,长时期作为唐朝安西都护府府治的龟兹,其商贸更多体现了服务于国家政治军事的特点,如军事物资粮食、马匹的周转贸易、屯戍士兵及家属的日常消费和商品交换;而西州自汉代以来一直是中原汉人迁入西域的重要地域,绿洲农业经济发达,耕织业水平较高。加之唐初就开始在西州进行大规模移民实边和屯戍活动,因此西州商品生产和交换频繁,商品市场和中转贸易更为成熟。

【关键词】安西都护府;西州;龟兹;商贸;丝绸之路

【中图分类号】S-09;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459(2016)03-0032-09

The Analysis on the Commercial Development of the Silk Road in the Tang Dynasty between Xizhou and Qiuci

ZHANG An-fu

(Department of History,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

Abstract: The Silk Road from Changan via Xizhou and Qiuci is an important channel for foreign trade in the Tang Dynasty. The Anxi Protectorate, which is in charge of the military and political affairs, is successively set in Xizhou and Qiuci and it has greatly promoted the expansion of the trade routes and merchants of this two places. However, on the nature of the Silk Road commercial development, the trade in Qiuci embodi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ilitary activities, such as the transshipments of military supplies and horses and the exchange of daily consumption commodities of garrison soldiers and their families. Xizhou commodity market is more developed that it has rich material goods, matured commercial trades and frequent international trade activities. Thus, Xizhou and Qiuci have closely connections on business trade and they also have strong complementary. And because of this, Xizhou becomes the important commodity supply ground and strategic rear of Qiuci. During the stable period, Qiuci also has a developed transshipment business trade owing to its important geographical location.

Key Words: Anxi Protectorate; Xizhou; Qiuci; commercial development; Silk Road

【收稿日期】2016-01-01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重大招标项目《环塔里木历史文化资源调查与研究》(11&ZD099);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资助(NAET-12-1-72)

【作者简介】张安福(1972-),男,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史研究。

中国古代社会的商业贸易很多是由政府推动的,唐代西域的丝路贸易也不例外。维护丝绸之路的通畅和东西方商业贸易的发展,是唐朝经略西域的重要目标,而安西都护府作为唐朝治理西域的重要军政机构,其府治先后置于西州与龟兹^①,在促进西域经济发展和商业贸易繁荣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安西都护府,“掌所统诸蕃慰抚、征讨、斥堠,安辑蕃人及诸赏罚,叙录勋功,总判府事”^②,集军事、政治、经济职能为一体,有效促进了当地经贸的发展。加之府治从西州到龟兹之间迁移,对沿途商路畅通、商贸群体扩大、城市贸易性质的变化,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唐代从西州到龟兹的商路,是唐朝经营西域的经济体现,是唐代丝绸之路贸易的缩影。

一、从西州到龟兹的商路与商人

(一)从西州到龟兹的商路

唐代西域的交通路网以西州、龟兹为中心,“银山道”、“焉耆—龟兹道”是两地之间的主要商路,也是丝绸之路中道的重要路段,同时,自唐朝控制天山南北之后,丝绸之路北道与中道在西州和龟兹等地多有连接交集,形成众多商路。

《新唐书·地理志》记载:

自(西)州西南有南平、安昌两城,百二十里至天山西南入谷,经礞石碛,二百二十里至银山碛,又四十里至焉耆界吕光馆。又经盘石百里,有张三城守捉,又西南百四十五里经新城馆,渡淡河,至焉耆镇城。^③

“银山道”,因途经银山碛而得名,是西州通往焉耆的要道。安西都护府为保障道路畅通,于西州至焉耆途中设有大量馆驿,依次有安昌馆、天山馆、礞石馆、银山馆、吕光馆、盘石、张三城、新城馆等,沿途合理布局的馆驿,为商旅往来提供了较为便捷的服务。

“焉耆—龟兹道”的商路,是连接银山道继而通往环塔里木盆地西缘及南缘疏勒、于阗等地的重要通道。安西都护府移至龟兹后,“东至焉耆镇守军八百里”^④,其间设有较多的军事设施,保护商路的通行和沿途安全:

自焉耆西五十里过铁门关,又二十里至于术守捉,又二百里至榆林守捉,又五十里至龙泉守捉,又六十里至东夷僻守捉,又七十里至西夷僻守捉,又六十里至赤岸守捉,又百二十里安西都护府。^⑤

由此可知,焉耆至龟兹两地交通沿线上布局的守捉、关隘依次有铁门关、于术守捉、榆林守捉、龙泉守捉、东夷僻守捉、西夷僻守捉、赤岸守捉,从而使得“银山道”、“焉耆—龟兹道”畅通东西。

西州和龟兹作为丝绸之路上的重要交易中心,除了上述主要干道以外,通往周边的交通网也四通八达。据《西州图经》记载,从西州通往周边地区的道路有十一条,其中北经“花谷道”、“移摩道”、“萨捍道”、“突波道”、“乌骨道”、“他地道”至庭州,西北经“白水涧道”可至轮台。魏晋时期丝绸之路“新北道”

① 安西都护府从贞观十四年(640年)建立,到贞元六年(790年),存在约一个半世纪。在唐朝治理西域时间中,安西都护府治所在西州和龟兹间有所反复,从局势上看,府治西州时期,为唐朝经略西域的初创期或战略收缩期;府治龟兹时期,是唐朝经略西域的成熟期或进取期。

② 《通典》卷32《职官十四·都护》,中华书局,1988年,第896页。

③ 《新唐书》卷40《地理四》,中华书局,1975年,第1046页。

④ 《通典》卷174《州郡四》,中华书局,1988年,第4559页。

⑤ 《新唐书》卷43《地理七》,中华书局,1975年,第1151页。

开辟后,这些路线将伊州、庭州、轮台等地连接在一起,并与从龟兹北上的“龟兹道”、“别迭里道”等连接在一起。

“龟兹道”,是从龟兹通往伊犁的商道,六世纪突厥在天山以北兴起后,环塔里木盆地各绿洲城邦经由龟兹道与突厥进行商贸和交往。唐朝统一西域后,商人、行旅,也多是通过“龟兹道”来往于天山南北。唐朝专门设置雀离关,管理龟兹进出天山南北的通道。与雀离关齐名的还有盐水关、拓跋关,这三个关隘并称为“龟兹三关”。三关依山扼河,从正北、西北、正西三个方向稽查行旅,保障丝绸之路畅通。

“热海道”,是唐朝丝绸之路上最有名也最为繁荣的一条大道,拓跋关就位于它的咽喉。沿拓跋关继续西行到拨换城,拨换城北接伊犁草原,西连疏勒、中亚,南通于阗。由此可见,西域形成了以西州、龟兹为中心,辐射天山南北以及中亚、西亚的商业交通贸易网。

(二)从西州到龟兹的商人

来往于西州与龟兹的商人主要有中原汉商、粟特、突厥商人等,这些商人往返于中原、西州、龟兹及中亚地区,从事辗转贸易。

粟特商人是往来于西州、龟兹间最为活跃的贸易群体,粟特商人从唐都长安出发,途经丝绸之路,将中原商品贩运至中亚、西亚等广大地区,返回时也会将中西亚的特产带回中原。吐鲁番出土的大量有关粟特商人的文书显示,往来于西域的粟特商人非常多,他们大都从事商品货物的转运贸易。

《旧唐书》载,康国人(粟特人)“善商贾,争分铢之利,男子年二十即远之旁国,来适中夏,利之所在,无所不到”^①。吐鲁番文书《唐开元廿年(732)瓜州都督府给西州百姓游击将军石染典过所》、《唐开元廿一年(733)染勿等保石染典往伊州市易辩辞》、《唐开元廿一年(733)石染典买马契》、《唐开元廿一年(733)石染典买驴契》等文书中就详细记载了粟特石姓商人染典频繁的商贸活动。其中《唐开元廿年(732)瓜州都督府给西州百姓游击将军石染典过所》记载了石染典往返于龟兹、西州、瓜州三地,从事牲畜贸易的内容^②。

吐鲁番出土文书《唐西州高昌县上安西都护府牒稿为录上讯问曹禄山诉李绍谨两造辩辞事》^③记载了商人曹禄山在西州、龟兹、弓月城从事贸易的活动,曹禄山是粟特人,其“客京师,有家口在”,其弟曹炎延也往返龟兹与弓月城从事丝绸贸易。吐鲁番阿斯塔那31号墓地出土文书《昭武九姓曹莫门隋等名籍》,所载曹姓商人32人,何姓7人,安姓2人,康姓2人,穆姓1人,另有奴3人^④。依姓氏分析,曹姓、何姓、康姓等人均是来自中亚的粟特胡商;吐鲁番出土的粟特语文书(T.ii.D.94)清楚地记录了粟特商人由西向东,分别经过拂菻(罗马)、苦国、波斯、安国……于阗、龟兹、焉耆、喀喇沙尔、高昌等地的行商路线,显示了粟特人在丝绸之路中段西州、龟兹等地频繁的贸易状况^⑤。

史籍载,突厥商人在西州、龟兹多从事与唐朝官方的马匹交易。安西都护府专门设置负责突厥马匹交易的场所——“突厥院”进行马匹贸易^⑥。据《资治通鉴》记载,杜暹任安西都护时,突骑施交河公主专门派遣牙官前往龟兹与唐朝官府商讨千匹马的交易事宜^⑦。相比龟兹,西州则设有马市,吐鲁番文书

① 《旧唐书》卷198《西戎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5310页。

② 《吐鲁番出土文书》第9册,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40-42页。

③ 《吐鲁番出土文书》第6册,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470-479页。

④ 《吐鲁番出土文书》第3册,文物出版社,1981年,第119页。

⑤ W.B.Henning, "Sogdian list", Sogdica, London, 1940, PP8-11. 转引自林梅村:《粟特文买女婢契与丝绸之路上的女奴贸易》,《文物》1992年第9期。

⑥ 刘安志、陈国灿:《唐代安西都护府对龟兹的治理》,《历史研究》2006年第1期。

⑦ 《资治通鉴》卷213《唐纪二十九》,中华书局,1956年,第6775页。

载有较多关于突骑施在西州以绢、钱进行马匹交易的内容,吐鲁番阿斯塔那 188 号墓出土文书《唐译语人何德力代书突骑施首领多亥达干收领马价抄》^①记载:

- 1 □钱貳拾贯肆伯文
- 2 右酬首领多亥达干马叁疋直。
- 3 十二月十一日付突骑施首领多亥达
- 4 干领。
- 5 译语人 何德力

突骑施首领多亥达干售予西州都督府三匹马,收入是“二十贯四百文”。何德力担任此次交易的语言翻译。另,吐鲁番文书《唐上李大使牒为三姓百姓纳马酬价事》^②、《唐市马残牒》^③、《唐西州都督府牒为便钱酬西州北庭军事事》^④也多记载在西州进行马匹交易的突厥商人。

中原商人自汉代就是西域商贸活动中的重要群体,唐置安西都护府后,大量中原商人在西州、龟兹等地从事商业贸易活动,由此出现了安置汉商的住所——行客营。《库车汉文文书》第 D.A.58 号《行客营名籍》^⑤与 D.A.115 号《行客营不到人名籍》^⑥载:

行客营
对头贺严光下五十人
贾庭璋 吴陵进 赵

行客营 到第三队
不到王令瓌

此外,出土史料中多次出现的贸易纠纷,也反映了中原商人贸易活动的频繁程度。在吐鲁番出土的文书中记载有关于中原商人与粟特商人贸易纠纷的案例:

- 1 高昌县 牒上安西都护府
- 2 曹禄山年卅 依检案内
- 3 牒得上件人辞称 向西州长史
- 4 在弓月城有京师汉名李
- 5 在弓月城举取二百七十五匹绢 向龟
- 6 兹阿兄相逐 从弓月城向龟兹阿兄更有
(后略)

此件文书反映了粟特商人曹炎延与中原商人李绍谨贸易纠纷一事:先有李绍谨在弓月城委托曹炎延代售“二百七十五匹绢”,并且二人约定一同在龟兹处理相关事宜。之后,曹炎延因故未能到达龟兹,且派遣其弟曹禄山向李绍谨索回绢帛,而李绍谨不同意,从而引发双方贸易纠纷。

总体看来,唐代在龟兹、西州等地从事商贸活动的商人中胡商占有多数,程喜霖先生认为胡商占

①《吐鲁番出土文书》第 8 册,文物出版社,1987 年,第 87 页。

②《吐鲁番出土文书》第 8 册,文物出版社,1987 年,第 84 页。

③《吐鲁番出土文书》第 8 册,文物出版社,1987 年,第 88-89 页。

④《吐鲁番出土文书》第 8 册,文物出版社,1987 年,第 86 页。

⑤[法]童丕等:《库车汉文文书》,巴黎法兰西学院汉文研究所,2000 年,第 74 页。

⑥[法]童丕等:《库车汉文文书》,巴黎法兰西学院汉文研究所,2000 年,第 100 页。

到西域商人总数的一半以上^①,他们一直是丝绸之路贸易中的活跃群体。这些商人和从事的商业活动,不仅体现了丝绸之路贸易的频繁,从其贸易的内容上,也可以看出龟兹和西州的区域贸易特色。

二、战略物资和屯区商品交换为主导的龟兹商贸

随着唐代丝绸之路的兴盛与唐朝经略西域重心的转移,西州与龟兹两地商贸客体既存在共同点,也有着些许的差别。共同点在于对中原丝绸、西方珠宝等的追求和沿途贩运以及本地日常生活用品的生产、出售,共同组成了丝绸之路贸易的中转站和贸易中心,但是在贸易形式方面有些许差别。在唐代,龟兹曾长期作为安西都护府的治所,形成了官方商贸为主的市场,商贸对象多为粮食、马匹等战略物资。同时,又因龟兹是唐朝在天山以南重要的屯垦区,境内的商品交换也极为频繁;相比之下,西州由于汉魏以来一直是重要的屯戍移民之地,加之处于从敦煌进入环塔里木地区的交通要道,农业经济水平高,商品生产能力强,中转贸易频繁,因此自由商贸市场更为活跃。

显庆三年(658),安西都护府移至龟兹,龟兹成为西域最为重要的军事重镇。武则天时期,王孝杰统兵三万镇戍龟兹,玄宗时期龟兹屯戍军民仍有两万四千人之多。为保证军需供应,带有官方性质的龟兹商贸应运而生。其中,和籾与马匹贸易成为龟兹商贸的主要内容,体现了龟兹的屯戍后勤保障和日常物资的市场潜力。

(一)和籾

“和籾”是指国家用钱或布帛向市场购买粮食以保障供给的一种商业行为。《新唐书·食货志》载:“贞观、开元后,边土西举高昌、龟兹、焉耆、小勃律,北抵薛延陀故地,缘边数十州戍重兵,营田及地租不足以供军,于是初有和籾”^②,龟兹虽是西域主要的屯区,但屯区耕作所获并未能完全满足数量庞大的驻军所需,因此和籾成为国家解决粮食供应不足的重要途径。在唐朝边贸中,“用布帛处多,用钱处少”^③,因此龟兹地区和籾贸易大部分是以布帛为媒介进行的,据《通典》记载,自开元至天宝年间,曾将凉府“二十万段物”^④运往龟兹,用于和籾;“伊西、北庭八万,安西十二万”^⑤,可见当时和籾的频繁程度。以《通典》记载天宝八年(749)为例,唐朝和籾总量达一百一十三万九千五百三十石,河西和籾数量为三十七万一千七百五十石^⑥,占据全国和籾贸易总量的32.62%,可以认为龟兹粮食贸易的规模是相当大的。《唐开元二十一年(733)西州都督府案卷为勘给过所事》^⑦中也体现了龟兹和籾的情况:

(上略)

125 安西给过所放还京人王奉仙

126 右得岸头府界都游奕所状称上件人无向北庭文,至

127 酸枣戍捉获,今随状送者。依问王奉仙得款:贯京兆府华

128 源县,去年三月内,共行纲李承胤下驮主徐忠驱驴,送兵赐

129 至安西输纳了。却回至西州判得过所,行至赤亭为患,

① 程喜霖:《唐代过所与胡汉商人贸易》,《西域研究》1995年第1期。

② 《新唐书》卷53《食货志》,中华书局,1975年,第1373页。

③ [清]黄宗羲:《明夷待访录·财计》,中华书局,1985年,第26页。

④ 《全唐文》卷287《张九龄·敕河西节度副大使牛仙客书》,中华书局,1983年,第2909页。

⑤ 《通典》卷6《食货6》,中华书局,1988年,第111页。

⑥ 《通典》卷12《食货12》,中华书局,1988年,第291页。

⑦ 《吐鲁番出土文书》第9册,第63-64页。

130 复承负物主张思忠负奉仙钱三千文,随后却趁来至
(下略)

开元二十年(732)三月,驮主徐忠雇京人王奉仙赶脚,送兵赐到安西。“兵赐”为发给将士充作薪金的庸调布帛^①,将士再用其换取粮食。当时,还有大量布帛充作军需运往安西用于和籴。在唐诗中,张籍在《凉州词》中写道:“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包括龟兹在内和籴的盛况。前述“行客营”中,有关于“第三队”、“五十人”等的记载,殷晴先生认为,这些记载说明了龟兹地区需要大量的绢帛,从而政府将商人编入到军营中,以 50 人为一队,在丝绸之路沿途运送绢帛等商品,“这就把军队也卷入到贸易的浪潮中”^②。

(二)马匹贸易

马匹是军队作战及运输的重要战略物资,大量用在屯戍驻军、驿站交通中。位于新疆库车县的唐王城,曾为唐安西统辖下重要的屯城之一,至今仍保留着占地面积约 2.5 万平方米的羊马城,可见当时战马需求量之大。唐朝为满足战马之需,开元中期曾“置朔方、陇右、河西、安西、北庭诸节度使以统之……设监牧,畜马牛。”^③天宝六年(747),唐玄宗派遣安西副都护高仙芝率军讨小勃律,“诏仙芝以步骑一万出讨。是时步兵皆有私马自随”^④,如此众多的马匹,一定有着相应的庞大马匹交易市场。

另外,唐代西域长行坊所需马匹也多由龟兹马匹市场交易而得。据吐鲁番阿斯塔那 506 号古墓出土《唐天宝十四载(755)交河郡某馆具上载帖马食历上郡长行坊状》^⑤载:

(略)

140 焉耆军新市马壹伯疋,准节度转牒,食全料。十一月十五日给

141 青麦壹拾硕。付押官元敬希 总管张子奇

142 北庭送 封大夫征马贰拾疋,送至柳谷回。十一月十八日,食青麦硕。

.....

193 廿二日,王庭晖下□新市长行马贰拾疋,食糜麦壹硕肆

.....

198 十二月十八日,安西送北庭新市马贰拾柒疋,食糜麦贰硕柒斗。付押官折冲刘

(略)

上述文书中所载“焉耆军新市马壹伯疋,准节度转牒,食全料”、“安西送北庭新市马贰拾柒疋,食糜麦贰硕柒斗”等,表明长行坊所用马匹部分是来自龟兹马匹交易市场。

(三)龟兹屯区的日常商品交换

唐朝与吐蕃反复争夺“安西四镇”的教训就是必须设置大量常备军镇守龟兹,因此,“自王孝杰克复四镇,复于龟兹置安西都护府,以唐兵三万戍之。”^⑥“开元中,置朔方、陇右、河西、安西、北庭诸节度使以统之,岁发山东丁壮为戍卒,增帛为军资,开屯田,供糗粮,设监牧,畜马牛,军城戍逻,万里相望。”^⑦如此庞大的军队驻守在这里,衣食住行不能完全依靠外地供给。此外,唐朝还允许士兵携带家属,“戍

① 荒川正晴等:《关于唐向西域输送布帛与客商的关系》,《东洋学报》第 346 页。

② 殷晴:《丝绸之路与西域经济——十二世纪前新疆开发史稿》,中华书局,2007 年,第 355 页。

③ 《资治通鉴》卷 223《唐纪三十九》,中华书局,1956 年,第 7146-7147 页。

④ 《新唐书》卷 135《高仙芝》,中华书局,1975 年,第 4576 页。

⑤ 《吐鲁番出土文书》第 10 册,文物出版社,1991 年,第 55-75 页。

⑥ 《资治通鉴》卷 213,中华书局,1956 年,第 6892 页。

⑦ 《资治通鉴》卷 223,中华书局,1956 年,第 7265 页。

守因屯田致富,则安于其土,不复思归。旧制,戍卒三年而代,及其将满,下令有愿留者,即以所开田为永业。家人愿来者,本贯给长牒续食而遣之……虽河朔诸帅得免更代之烦。”^①《唐六典·兵部》中也记载:“天下诸军有健儿……其家口情愿同去者,听至军州,各给田地房屋。”这些数量庞大的常住人口,成为龟兹屯区商品交换的消费群体。

从目前已发现的屯城、屯田及遗留的生活区来看,这里的商品交换规模是非常大的。单是渭干河西岸就发现了 46 处唐代遗址,这个遗址群占地面积 2500—3000 平方公里,是唐朝在安西屯田驻军的重要遗址群,其中规模比较大的是通古斯巴西古城。古城位于新和县塔格托格乡通古斯巴西农场西南处,曾是唐安西都护府时期的军屯中心,该城出土有大量用于商品交换的货币,除了唐王朝发行的“开元通宝”、“大历元宝”、“建中通宝”等,还有龟兹自铸的小铜钱,这些龟兹出土的铜钱数量庞大,种类繁多,说明龟兹屯区日常商品交换的频繁程度。另外《大谷文书集成》收录有通古斯巴西出土的文书《唐大历十五年李明达借粮契》、《大历十六年三月杨三娘举钱契》、《建中五年孔目司牒》等,这些粮契、钱契、官契也说明了龟兹本地的商品贸易发展的情况。

三、以商品生产和中转贸易为主的西州商贸

西州,自汉代以来就是重要的绿洲农业区,是中原进入西域的门户。魏晋时期,大量的中原人为躲避战乱进入西州,带来了中原先进的耕织技术,提高了西州农业生产水平。经过多年的发展,西州商品贸易发展迅速,尤其是唐朝经营西域以来,一直将西州作为经略西域的后方基地,使得西州的商品生产能力进一步增强,以粟特人为代表的丝绸之路商人云集于此。因此,西州依托丝绸之路的商品生产和中转贸易更为兴盛。

(一) 商品生产

农产品的商品化是西州商贸活动中较为常见的形式。农业灌溉技术及生产水平改善,促进了西州农作物种类的多样化和产量的提高。西州粮食作物有小麦、大麦、粟、黍、稻,经济作物有草棉、蚕桑、大麻等。出于人们日常生产生活的需要,这些农产品加工品,如粮食、干果、布帛、编织物等,成为西州商贸市场的基本内容。吐鲁番出土文书《天宝二年(743)交河郡市估案》中,涉及的商行种类有谷麦行、米面行、帛练行等四十多种,商品有百余种之多,即使是每一种商品也都列出不同级别、不同价格的分类,体现了西州地区丰富的商品。

西州庞大的商品市场,首先体现在西州地区拥有较高的商品生产能力,较为典型的是布帛与丝织品。西州的布帛,有很多为当地所产,“縠布”即是《新唐书·地理志》中所记载的西州自产贡品“氍布”,是西州商贸市场中常见的商品,阿斯塔那古墓出土《唐縠布帐》^②记载:

- 1 布壹端付和叶子 布壹端付赵秋德
 - 2 布壹端付孙知姜 布壹端付竹守欢
 - 3 縠两端付孟胜住 縠壹端付陈绪隆
 - 4 縠两端付皂家王阿闾利妻 [画指]
 - 5 縠三端半付王阿利
 - 6 布壹端五月廿八日付史苟仁妻 [画指]
- (后略)

^① 《资治通鉴》卷 232,中华书局,1956 年,第 7615 页。

^② 《吐鲁番出土文书》第 7 册,文物出版社,1986 年,第 490 页。

縹布帛是官府将白布分摊给服徭役民户所记的账历。当时,西州地区均田民户除缴纳租赋之外,需以生产縹布代其他徭役。由文书中知,产縹布以代徭役的民众众多,既有赵、孙、孟、陈等汉姓,又有竹、史等胡姓,可见西州縹布生产之普遍。

《唐开元三年麴娘墓志》中,“晚弄穷梭,鸳纹出于红楼”等记载,也记载了西州家庭丝织品生产的场景:^①

(上略)

6 □极事□诚深奉国杭席仁义履践膏腴夫人郎公之长女□□□

7 □株梢月容而吐秀滋兰九畹带风包以抽翹耀掌方珠□□□□

8 晨□彩笔鹤态生于绿笺晚弄穷梭鸳纹出于红楼暨□□□□□

(下略)

其次,西州葡萄的加工生产和商业化能力进一步提高,葡萄干、葡萄酒的交易更为频繁。《高昌延昌西岁屯田条列得横截等城葡萄园顷亩数奏行文书》^②载,高昌时期该地葡萄种植面积“壹顷拾三亩半”,至西州时,已扩至“三顷一十”余亩。《天宝二年(743)交河郡市估案》记载“干蒲萄壹胜上直钱拾柒文、次拾陆文、下拾伍文”等,说明葡萄干种类繁多,按照不同品次分价出售,《唐上元三年(676)六月后西州残文书》^③中记载西州葡萄酒生产中有专门酿造葡萄酒的酒匠,体现了其专业化生产程度。

除布帛、丝织品、葡萄加工外,西州的家具、铁器、石器等手工业商品市场亦较为兴盛。吐鲁番出土的《唐惠安等匠人名籍》、《唐贞观十八年(644)匠康始延等请给物牒》、《唐何好忍等匠人名籍》,均明确记载了皮匠、支匠、木匠、缝匠、铁匠、泥匠、石匠、画匠、油匠、杀猪匠、连甲匠等,《唐何好忍等匠人名籍》中载^④:

1 ———□延海 白佑人

2 □□一人缝匠

3 ———了 曹阿短 曹提拖 曹□□

4 □□龙 何好忍 康施延

5 右件 人韦匠

6 焦守相 翟守仁

7 右件人皮 匠

8 阳资胡 阳海隆 严处欢

9 右件 人木匠

(后略)

文书中记载有从事缝匠、韦匠、皮匠、木匠等百姓、康姓、曹姓、何姓、焦姓、阳姓多种胡汉手工业者,说明了工匠群体的广泛性以及当时西州手工业的兴盛情况。

(二)中转贸易

除了西州当地的商品生产外,西州更多承担了西域商品中转贸易的角色。敦煌到楼兰的“大碛道”衰败之后,西州作为连接丝绸之路东西的重要交通枢纽,逐渐成为丝绸之路中段重要的商贸中转站。其中转贸易商品种类多、产地广,有来自唐朝内地的练、縵、生绢、绫、纱、布等丝织品;亦有来自中亚的

①《西域碑铭录》,戴左良编著,新疆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18页。

②《吐鲁番出土文书》第5册,文物出版社,1983年,第2页。

③荣新江、李肖、孟宪实主编:《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中华书局,2008年,第74页。

④《吐鲁番出土文书》第4册,文物出版社,1983年,第15页。

香料、珍珠、金银制品等奢侈品,驼、马、药材等日用品。从今天遗存的唐代西州的府治高昌城建筑遗迹布局来看,其商品贸易非常发达:高昌城南分布着密集的居民住宅、手工艺作坊和商业市场,在固定的商业区内,有着鳞次栉比的商铺,有商贩固定交易的场所,交易着各种琳琅满目的商品,显示了西州发达的商品市场和交易情况。吐鲁番出土文书《天宝二年(743)交河郡市估案》中,不仅有着西州本地的商品产出,也有大量的来自中原内地、江南地区的商品,更有来自中亚、西亚欧洲的商品,这些商品不仅品种繁多,而且同一类商品也是按照质量不同,在价格上分为上、中、下三等;在市场管理上,同样设置了不同商品的“行”,并有规范的市场管理。

这些中转贸易最为典型的是丝织品和毛织品。根据大谷文书《唐天宝二年交河市估案》^①记载:西州帛练行不仅有当地生产的丝绸,还有大量产自中原梓州的小练、产自河南府和蒲陕州的生纈,产自北方及四川的绢^②。布行中有产自常、扬、湖、江、庐等地的杂州之贮布,产自黄、庐、和、晋、滁等地的贻布,宣、润、沔等地的火麻布以及小水布、大棉等种类。此外,还有来自波斯、印度、东罗马等地的毛织品。中外的丝织品汇聚到西州商贸市场,然后由活跃于丝绸之路商道上的粟特、突厥以及汉商将其转运到其他地区进行贸易,这些人成为活跃在西州商品交换中的主要群体。尤其是唐朝经略西域中期,随着丝路的通畅,大量商人汇聚西州,带动了商品流转,使西州成为丝路上重要的商品贸易中心。

综上所述,西州地处吐鲁番盆地,自汉晋以来就是中原屯戍之地和贸易中心,有着发达的农业文明和商品贸易市场,安西都护府最初设置于此,是与唐初西域形势和西州的经济状况相适应的。随着唐朝经营西域的战略重心西移,西州更多承担了后方基地的战略补给任务,丝绸之路贸易的中转作用日益明显,其绿洲经济和民间商业贸易水平也不断提升。

应该说明的是,虽然龟兹相较西州,驻军消费及军事性质的国家贸易频繁。但是,由于龟兹地处丝绸之路要道,在西域局势相对稳定之后,交换贸易和中转贸易也较为频繁,出土的一些吐鲁番文书中也有相关记载。此外,由于唐代形成西域相对统一的局面,黠戛斯等地也有大量从龟兹、西州等地购买的锦、罽、绫等物^③,体现了丝织品途径龟兹中转远至天山北麓庭州等地,再由此转易于北部的回鹘人聚居地的贸易情况。另外,考古学家在古龟兹地区发掘的大量唐代东西方的多种货币,除了唐朝官府发行和龟兹本地生产的货币外,还出现有“突骑施铜钱”、“萨珊银币”等,也体现了龟兹作为东西方贸易中转站的情况。

[参 考 文 献]

- [1] 刘安志,陈国灿.唐代安西都护府对龟兹的治理[J].历史研究,2006,(1).
- [2] 程喜霖.唐代过所与胡汉商人贸易[J].西域研究,1995,(1).
- [3] 殷 晴.丝绸之路与西域经济——十二世纪前新疆开发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2007.

① [日]池田温:《中国古代籍帐研究》(龚泽铨译),中华书局,2007年,第305页。

② 王炳华:《吐鲁番县出土唐代租庸调研究》,《文物》1972年第10期。

③ 《新唐书》卷217《回鹘下》,中华书局,1975年,第6146-6148页。